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安徽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曹虹:《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　指出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初的有识之士利用时代与地域条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拓展了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不仅自觉靠拢六朝审美,而且确立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审美主导理念。晚清骈文界深化认识"六朝"作为典范的审美价值,积淀了深厚的理论与创作成果。清代的"六朝"观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重要内涵。

河南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易图强:《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关系评析》　指出从新中国畅销书出版传播的历史来看,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一方面,时代制约、决定着畅销书,即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这种图书得以出版并畅销的客观条件,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影响着时代,即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了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了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图书的畅销,既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可能阻碍历史前进,畅销书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短期或长期的作用。也就是说,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

苏州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陈才智:《白居易接受史研究论略》　指出白居易接受史研究,一方面生根自本土,一方面需要借镜于异域。其研究的范围,涉及以白集文献整理者为主体的白集编纂史,以历代白居易诗文选本与评点为主体的选本沉浮史,还有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接受效果史,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作品效仿史,以文学批评家为主体的作品评论史,以作家为主体的接受影响史。从时间线索上展开的接受史研究,与从空间领域展开的诗迹研究加在一起,一纵一横,是未来白居易研究值得大力拓展的两个方向。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史客观性、突出特点及制度创新要求》　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克服新失衡,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的历史性命题,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有其紧迫性,有其针对性。进而,也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改革深化。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侯敏:《梁启超 1922 年南京讲学的文论向度》　指出梁启超 1922 年在南京讲学和演讲中所秉持的学术立场值得人们回味。梁氏的讲学活动显示了一种文化自觉,其诗学解析与文化阐释,激起了一定的反响。梁氏演讲内容充实而隽永,文论具有中庸而调和、稳健而温和的特点,充满着宽阔的文化视野和精深的历史质感。这与当时的学衡派和新文化派人士的文化立场有所不同。梁启超的南京讲学,启人心智,发人深省,对后人了解梁氏后期的文论思想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的论争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邓刚宏:《美日两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　文章通过对美日两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演变分析,发现两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都最终走向了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相统一的模式。只是两国的路径不同,美国从最初的主观公权利模式转向了混合模式,即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的统一。而日本行政诉讼法深受美国行政法的影响,同时也兼有德国行政法的特点,总体上经历了从大陆法系模式向普通法系的变迁。美日两国这种殊途同归的历史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对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定位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欧建平:《永远的丝路 难产的经典——透视新时期以来的"丝路"主题舞剧》　指出 100 多年来,"丝绸之路"作为穿越时空、魅力无穷的文艺创作题材和大型活动主题,一直让沿途各国的艺术家和活动组织家们魂牵梦绕。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城市,这个题材更是炙手可热。文章以 7 部这一题材的舞剧为个案,重点介绍其中开先河的《丝路花雨》的创作背景、情节线索、艺术特色、精彩舞段和所获殊荣,逐一点评随后的 6 部舞剧,并对近年来的"舞剧热"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批评,诸如自身创作实力和主演阵容的严重不足,在编剧上出现"剧情短路"现象,在编舞上的"舞—剧分离"的问题,以及在包装上相互攀比等。藉此,希望为几部具有"高峰"品相的舞剧问世提供前车之鉴的同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走进来"提供思路。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孙景鹏:《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的多维表现》　指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无论是想象、探索、追求乌托邦,还是质疑、批判、反对乌托邦,都暴露了乌托邦无法超越、不可避免的弱点:荒诞虚妄、盲目空想、异化虚无。这正是乌托邦一直遭人诟病的原因所在。在《人面桃花》中,革命乌托邦探索的锥心之痛暴露了乌托邦的荒诞与虚妄;在《山河入梦》中,工业乌托邦实践的可怕梦魇揭示了乌托邦的盲目与空想;在《春尽江南》中,欲望乌托邦的无底深渊展现了乌托邦的异化与虚无。其实,乌托邦的荒诞性和虚妄性、盲目性和空想性、异化性和虚无性都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在格非的乌托邦叙事中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达到了一种互文的效果,展现了格非乌托邦叙事的独到之处。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余华、彭程甸:《高校治理结构优化与治理阻力化解探析》　指出高校治理结构分

为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涉及政府、社会、高校法人及高校内部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配置和权限划分;高校治理阻力是高校治理能力提升过程存在的消极因子,主要源于高校治理结构的缺陷,即高校治理结构的混乱、无序和不合理。优化高校治理结构必须理顺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和保障高校独立法人地位基础上建立高校外部的多元治理格局;构建党委集体领导、书记政治治理、校长行政治理、教授学术治理、学生学习自治、教职工民主治理的"六位一体"参与治理模式,建立健全董事会制度,调整校级领导产生方式,实行教育家治校。化解高校治理阻力必须转变相关主体思想观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调整既得利益关系。寻找高校治理结构与治理阻力的平衡点,既要思考如何优化治理结构减轻治理阻力,又要探究如何化解治理阻力为治理结构调整扫清障碍。

石河子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陈思广、廖海杰:《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指出 1930 年代与互相攻讦的左右翼文学相区别而存在的自由主义文学群体以理性和个性为共识,通过大型文学杂志如《现代》《文学》《文学杂志》《文学季刊》等为平台,试图构建一个包容而理性的文学生态,从而实现文化上改造社会的目的。在此生态下的长篇小说接受,呈现出独立的、审美的、建设性的接受样态。这也是理性、包容的自由主义文学生态的题中之意。虽然在许多时候,独立、审美与建设的批评只是一个大的倾向和追求,但初步形成的批评家群体及其所示范的接受样态,为《子夜》《家》《骆驼祥子》《死水微澜》等现代长篇小说名作在 1930 年代的出现铺垫了肥沃的土壤。全面抗战的爆发中断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常态化发展,使得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生态的建设仍处于雏形阶段,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即时间较为短暂,空间较为狭窄。"时间的短暂"使得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下的长篇小说传播接受失去了进一步深化完善的可能;"空间的狭窄"使得自由主义文学生态仍分布在少数大城市,新文学作家主要居留于平津和上海两地,一些优秀作品未能得到及时的传播接受,新文学仍未进入大众之中。不过,即便如此,自由主义文学群体所构建的文学生态仍具有示范意义,值得我们重视与肯定。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6 期　徐国琦:《何为中国:1919 年的中国和世界》　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战争中。大战的经历和结果,迫使中国的精英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可能的地位。"一战"初期,严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大战,可是欧战结束后,严复彻底幻灭了,认为唯有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才能解救中国和西方。与此同时,在欧洲游历的梁启超在亲眼目睹了战争的可怕影响之后断言,这场欧战近乎消灭了人类文明;他放弃了达尔文主义,认为东方现在可以提供一些西方所没有的价值,鼓吹东西方文明的融合。而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理与欲的和谐和平衡",中国文化处在一个高于西方文化的水平上,中国文化当引导西方人走向儒学之路。"一战"将全新的观念注入中国精英的思想中,形塑了他们之后如何思考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国族认同和中国文明的方向。

西北师大学报　2016 年第 4 期　赵孟营:《社会治理现代化: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　指出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借助于政治叙事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阶段,而提出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意是要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领域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必须通过生活实践本身来确立其现实合法性,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转向生活实践的关键路径是区别与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有别的中间设计: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机制,这一治理机制包括四个基本成分,即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合法化的委托—代理机制、有限责任分担机制和可持续合作动力机制。生活实践的"善治"实现就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完成,其主要标志就是理性化的治理主体关系结构的生成。

吉林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4 期　朱凤瀚:《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　指出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言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随后,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立三年乃东徙于成周。按照此段文字之语法关系与语序,"周亡王九年"应理解作攜王被晋文侯杀后,周王朝乃有九年无王,而周平王是在无王九年后方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在攜王立前平王已以太子身份先立,并被称为"天王"。攜王被立后,出现"周二王并立"局面。可见《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攜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而《纪年》则强调平王之太子与"天王"身份。二者所以发生差别的原因,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之不同。依照《系年》,周平王被晋文侯拥立时间与史载晋文侯及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平王的郑武公等人的生存年代有悖,《系年》所云攜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很可能是晋文侯二十一年之误,与一说古本《纪年》自殇叔四年(即周幽王元年)后以晋纪年合。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4 期　陈元锋:《"吏"与"诗":宋代诗坛流行话题之一——以南宋为中心》　指出唐宋时期,由科举制度造就的进士官员阶层,多为娴熟诗赋之辈。但吟咏之"余事"与日常之"职事"难免冲突相妨,一方面,诗歌既可消解"吏尘""俗氛"。缘饰"吏事""俗务";另一方面,簿书狱讼之困、驰骛应酬之劳不免滞塞诗思,给诗人带来烦扰。至南宋中后期,选人改官困难、举子科场失利等因素,导致诗人与官员、诗歌与科举的疏离,诗人群体分化,"诗人"意识自觉。从"作吏"与"作诗"的对立,从"官本位"到"诗人本位"的转换,从城市州府至江湖乡村,可以窥见南宋诗人避俗趋雅的文化心态与诗坛风气的转向。